

# 当代中国史学

顾颉刚  
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# 当代中国史学

顾颉刚  
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代中国史学/顾颉刚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23

ISBN 978-7-208-18276-9

I. ①当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史学-研究-中国-1845-1945 IV. ①K207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(2023)第 081948 号

责任编辑 罗俊华

封面设计 周伟伟

## 当代中国史学

顾颉刚 著

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)

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
印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8.25

插页 5

字数 111,000

版次 202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2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8276-9/K·3283

定价 68.00 元

## 前 言

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，能像顾颉刚（1893—1980）那样中外闻名的，没有几人。而像顾那样，以名人专家的身份，高屋建瓴，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，似乎更为少见。由此看来，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。俗话说：文品如人品。这表明，两者之间又有联系。那么，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。

民国时期的学界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的朋友胡适之。”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（1891—1962）为荣、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。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，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。的确，胡适之交游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车夫马弁，在同类学者中，并无几人可及。但其实，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，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。而在他们当中，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。1917年，胡适自美归国，任教北京大学。虽然

在回国以前，他已经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，博得一些名声，但要想在北大立足，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，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，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，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，因此心存不安。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，因为他所面对的，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，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。在他们当中，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。出身苏州世代书香、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“江南第一读书人家”的顾颉刚，在去北京念书以前，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“经书”，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，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。可幸的是，胡适的新方法、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，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：“他虽没有伯弢（陈伯弢——胡适的前任）先生读书多，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”。更重要的是，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、而又能“放言高论”的同学傅斯年（1896—1950）去听胡适的课。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，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。

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，顾颉刚虽然没有“暴得

大名”，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。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，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，并协助胡适编书。在工作中，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，因此追根寻底、顺藤摸瓜，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，由此而发起了“古史辨”的争论。此时的顾颉刚，才三十左右，但已经全国闻名了。与他相比，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、罗家伦（1897—1969）等人，尚在海外辗转留学。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，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，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：“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！”。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，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，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，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。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，在回国之际，则写信给顾颉刚，希求后者的帮助，谋求教职。<sup>①</sup>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，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，从一位年轻的学生，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。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傅斯年评语见《傅斯年全集》（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80），页1499—1542。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《历劫终教志不灰：我的父亲顾颉刚》（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7），页60。罗在回国以前致信顾颉刚，则见于《中山大学周刊》，2—14（1928年1月），页399—401。

未免感叹：“士别三日，则当刮目相看”。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：“几年不见颉刚，不料成就到这么大！”<sup>①</sup>的确，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，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，而且已经远播海外。美国汉学家恒慕义（Arthur W. Hummel）在《美国历史评论》上撰文，介绍顾颉刚、胡适关于古史的讨论，并把顾颉刚的《古史辨》第一册自序，译成了英文出版，题为《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》，俨然把顾颉刚视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代表。<sup>②</sup>恒慕义的作法，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。1971年，美国史学家施耐德（Laurence A. Schneider）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，题为《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》，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。<sup>③</sup>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，这

---

① 见上引《傅斯年全集》，页1499—1542。

② 恒慕义的文章为“*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?*” *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*, 34:4 (1929), 页715—724。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，见 *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* (Leyden: J.B.Brill, 1931)。

③ 施耐德的书见 *Ku Chieh-Kang and China's New History: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1)。

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，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。而在国内，虽然顾颉刚的名字，称得上是家喻户晓，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，则要在其过世多年以后。这里的原因，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，有所联系，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《历劫终教志不灰：我的父亲顾颉刚》的后半部分，有比较清楚的描述，此不赘言。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“古史辨”加以专题研究的，始在20世纪80年代末，如刘起钎的《顾颉刚学述》、王汎森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》等好几种。德国汉学家吴素乐（Ursula Richter）于1992年亦出版了《疑古：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》，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。<sup>①</sup>

## 1. 坦诚相见、文如其人

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，顾颉刚与胡适一样，

---

① 刘起钎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。王汎森的书1987年由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出版。吴素乐的则见 *Zweifel am Altertum: Gu Jiegang und die Discussion über Chinas alte Geschichte als Konsequenz der "Neuen Kulturbewegung" ca. 1915—1923* (Stuttgart: Franz Steiner Verlag, 1992)。

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。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，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《古史辨》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。因此，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，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，使后人能不断为之“树碑立传”。但是，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。胡适成名之后，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，深知史料的重要，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，包括日记和手稿，非但字迹工整，而且思想清晰，没有暧昧之处。即使有暧昧之事，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。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\恋情，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，而为今人所知。顾颉刚则稍有不同，堪称“性情中人”，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。这里的感情，并不专指男女之事（当然也有他对谭慕愚长达半个世纪的情愫），而是指他对学问、人生、友情的看法。顾颉刚的《古史辨序》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一旦有了机会，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，不吐而不快。几乎每次“古史辨”讨论结集，只要是他负责，他就会写一篇长序，直抒胸臆，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，其中的甘辛苦涩，一并呈现，让读

者知晓。因此读他的序言，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，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。他们都是“五四”时期的人物，都受到那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，虽然治学兴趣不同，但个性风格有相似之处。顾颉刚的这种文风和性格，对历史学家来说，则是莫大的喜事，因为他自愿地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材料，为史家和读者了解他的为人治学，有极大的助益。略微可惜的是，本书篇幅不大，又以评论旁人的作品为主，因此并不能让顾颉刚尽兴发挥。但是，他的文风性格，还是有所体现。他所用的评语，非常直接、干脆，没有保留。他有时甚至将几个人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排名，分出名次，充分表现了他直率、真诚的个性。

当然，顾颉刚能这样做，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，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。由此，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，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。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，此时的顾颉刚，虽然刚过五十，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，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。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（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），自然有点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的

味道，读来十分过瘾、亲切。但是，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，而是力求公正。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。

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，但他的成长，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，坐拥书城，整日“之乎者也”，只啃那几部经书。相反，他由于年幼体弱，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，从祖母那里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，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。以后到北京求学时，又迷上了京戏。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，都有兴趣。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。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，自己又很早成名，但他的待人接物，则较少“名士气”，而是显得真诚、宽容，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、提拔后进。他的治学，也往往高低兼涉，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，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。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，如所谓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”的说法，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。这一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”，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。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，一部剧作的剧情，往往始简而繁，经过几代

人的加工，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、跌宕起伏。他由此提出，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，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，愈到后代，其对古代的认识，似乎愈益清晰，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。其中的原因，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。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，传说中的圣贤禹，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，并不是一个真人。只是到了后来，人们才把古史传说“拟人化”，将尧、舜、禹等奉为远古的“三代圣主”。他的这一说法，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，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。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，从人们的常识出发，显得简明易懂，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。而且，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，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，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，因此使得“古史辨”的运动，在20世纪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。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，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，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。

但是，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，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，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，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，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，以

求在科学的、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，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。可惜的是，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，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，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“疑古”的、“破坏型”的学者。而其实，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、甚至破中求立的。因此，他还是一位“建设性”的学者。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，已经提到“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”。

本书的写作结构，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、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。本书有三编，代表了三个部分，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。在顾颉刚看来，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分，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他把新史学的成功，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，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，而“古史辨”之功劳独大。但他的重点，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，如“安阳甲骨文的出土”、“西北文物的发现”、“敦煌石室的发现”和“铜器的新发现”。他把这些实物史料，列于文献史料之前，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

料的成就，特别加以列出，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。于是，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，虽然顾颉刚把“古史辨”的运动列于书末（第五章），但他并不认为“古史辨”集了新史学的大成，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。相反，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，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。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，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，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。而是他昔日的好友、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。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，以“史学只是史料学”为信仰，以“我们不是读书人。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为口号，以“凡能直接研究材料，便进步”、“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”和“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，则进步”为目标，对中国文明的遗址，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，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，获得了新的认识。<sup>①</sup>这一新的认识，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，与“古史辨”所得的结论相反。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

---

① 见傅斯年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》，《傅斯年全集》，页1301—1312。

怀疑古史的立场，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，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，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，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，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，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。

## 2. 宽容大度、中肯客观

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、支持的态度，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，也一视同仁，能帮忙处便帮忙，能推荐处则推荐，因此他之提携后进，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。抗战以前，初出茅庐的学者，常常追随三大“老板”，分别是“胡老板（胡适）”，“傅老板（傅斯年）”和“顾老板（顾颉刚）”。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，财力雄厚，傅斯年创办了“中央”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，与“中央”研究院的关系，非同一般。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，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，势力更是庞大。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、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，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。

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，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。<sup>①</sup>顾颉刚对钱穆（1895—1990）的提携，就是一段佳话。钱穆在1929年以前，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，辗转于无锡、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，利用业余时间治学。一个偶然的机，使他遇见在苏州养病的顾颉刚。顾颉刚慧眼识才，在读了钱穆的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手稿之后，推荐钱入京教书，先到燕京大学，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，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。虽然在1931年以前，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、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；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《国学概论》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。<sup>②</sup>但是，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，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

---

① 参见顾潮《历劫终教志不灰》，页179。

② 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关系，参见余英时《犹记风吹水上鳞》，余著《钱穆与中国文化》（上海：远东出版社，1994），页7—18；傅杰《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，第64辑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），页248—307；以及王晴佳《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，1926—1950》，《台大历史学报》（台北：台湾大学历史系），第26期（2000年12月），页121—149。

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，则显然可能性不大。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。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，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。

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、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，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。上面已经提到，本书写于1945年，在艰苦的抗战之后，学术界百废待兴、急待重整。但如何重整、重振，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，因为抗战的爆发，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。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，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，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，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。本书既然是以《当代中国史学》为题，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、兼顾大家的态度，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。顾颉刚之宽容大度、不含偏见的品格，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。上面已经提到，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，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、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。同时，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，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。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